

明代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特色

陈 学 文

一

杭州自从南宋以来，工商业已十分发达。可是从明初至正德末却有一段冷落时期，城市经济不如南宋繁荣。嘉靖以后才逐渐恢复和发展，到了万历年间，杭州“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①，“舟车所凑，湖山所环，其四方之游士贾客，肩摩踵蹶”^②，已是工商业兼旅游业的大都市了。

下面分别从手工业、商业、旅游业和人口结构诸方面加以论述。

（一）手工业：

杭州及属县盛产纺织品。万历《钱塘县志》内载布类有七种：绵布、苎布、麻布、葛布、綦布、黄草布、兼丝布。丝织品七种：绫、罗、苎纱、纱、绢、绸、縠。这大致接近万历《杭州府志》所记的绫、罗、苎丝、纱、绸、縠六种。杭州城内丝织业除了官府经营的工场外，尚有一大批个体小生产者与作坊、工场。棉布多产于市郊的市镇笕桥一带，丝织品集中于城东和城东北。姚震说：“迄今一乡之人皆织绫绵为业。”^③“县民织者皆众，直隶，今江西等省，皆买之。”^④《北隅掌录》曾载，城北张纱衙蒋昆丑所设的作坊，以生产团花疏朵、轻薄如纸的皓丝“名重京师”，畅销国内各地。当时杭州丝织品品种繁多，技术精良。如縠，是用丝织成的绉纱。有花纹的称为锦，轻薄者称为纱、绫。布类中的綦布是麻与苎交织成青白两色相间的苎麻布。黄草布是丝与棉的交织品。余杭产的细苎麻布是夏天制作凉衫上好材料^⑤。临安县善织绢，“织者甚众”^⑥。

杭州所产丝织品驰名于国内外，除上供外，运销各地。张瀚说：“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绫、绢、苎，而三吴为最。”“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绫缁帛者，必走浙之东也。”^⑦远在北方的宣府镇上设有“苏杭罗绸铺”，偏僻的江西铅山市场上也有“杭绢”发售^⑧。

杭州、苏州、福建是明代全国三大印书业中心。苏州以刻印精良见称，但价格昂贵；福建以量多取胜；杭州则恰得其中并兼而有之。杭州所刻的书本销售极广，是全国四大书市之一。书肆集中在镇海楼外、涌金门内、弼教坊、清河坊前一带。也有流动书贩，待省试时把书摊摆到贡院前，也有摆在天竺、岳坟等风景区，佛经则在昭庆寺等寺院中出售。由于杭州及属县都出产纸张，“邑山率造纸为业，老小勤作，昼夜不休。”^⑨为印书业提供了纸张原料。

杭州明时海运河运十分发达，又为适应西湖游船建造的需要，在这里也发展了造船业，如设有钱塘宝船厂和仁和造船厂，能建造载重近千石的大船。

杭州的泉水多且清冽，是酿酒最理想的水源。明代杭州酿酒业颇发达，产有虎跑泉酒、

珍珠泉酒、梅花泉酒、百花酒、秋露白、麦烧等名酒^⑩。

当时杭州的制锡箔业规模也很大，产品远销京师诸地，闻名全国。

（二）商业：

万历时杭州“内外衢巷，绵亘数十里”^⑪，据聂心汤目击：“入钱塘境，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阨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五方辐凑，无赢不售。盖物盛所聚，何必自其地产哉！”^⑫杭州市场上不仅有湖州的丝、嘉兴的绢、绍兴的茶和酒、宁波的海味水产、严州的漆、衢州的桔、温州的漆器、金华的酒、处州（龙泉）的瓷器^⑬，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夹城巷一带，“市廛殷阜，肩摩踵接。”^⑭清河坊一带更是繁华，明嘉靖时人叶权说，它的繁荣热闹可与苏州的阊门、广州等著名商业区媲美^⑮。当时杭州船钞商税额达190万余贯，钱381万余文，折色船料商税正余银36,800余两^⑯。

杭州水路商埠集中在湖墅、江干两地，货物由水路运到这里集散^⑰。此外，云锦桥一带，也“官商驰骛，舳舻相衔，昼夜不绝。”^⑱

除了固定街市上的商店外，还有许多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的集市。如官巷口是花市，炭桥是药材市，北关门外卫桥是米市，东青门坝子桥是菜市，候潮门外是鲜鱼市与南行猪市，衙湾是蟹市，钱塘门外是花团市，候潮门外泥路一带是青果团市，还有羊市、布市、肉市、珠子市、柑子市、鱼鲞市等，专门经售农村农副产品，以满足市民生活需要^⑲。

杭州市内还设有夜市。如寿安坊夜市，“百工技艺蔬果鱼肉，百凡食用之物，皆于此聚易，夜则燃灯秉烛以货”^⑳。

新开运河从武林门外北新桥起，北接苏州、镇江。苏北的大米大量运入杭州。钱塘江口还是对外贸易的吞吐港，“舟舰上下，绡帆云布”，大量丝绸等商品由此远销到海外各国^㉑。

在工商业活动中，各行各业都有自己隐秘的习俗用语，以便内部交流行情，“至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㉒这种“市语”并非行会的行语，正是王君玉《杂纂》中所说的“难理会，经纪人市语。”这里的行也并非行会组织，仅仅是职业的分工。

（三）旅游业：

杭州风景秀丽，又有许多寺庙古刹、文物古迹，宋元以来早已蜚声于海内外，美丽的西湖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游客。顾炎武说：“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那些“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均赖此生存^㉓。特别是上元节、香市，各地游客、香客纷至沓来，天竺、岳坟、湖心亭、昭庆寺一带，“前后左右各行店面云集”^㉔。商品品种繁多，“三代八朝之骨董，蛮邦闽貉之珍异皆集焉。”^㉕

（四）人口结构：

杭州城市人口万历四十年为280,322丁口，如果以每户二丁计，则约七十万有余。我以为杭城有数十万人口的估计还是可信的，如顾炎武就说：“杭城北湖州市（此是指钱塘县城内的湖州市——引者注），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而河北郡邑乃有数十里无聚落，即一邑之众，尚不及杭城南北市驿之半者。”^㉖

杭州城内居民多来自四方，其中“旦暮佣作”的“游手浮食之民”占很大比重^㉗，使城市人口结构起了重大变化，它已不象古代那种以官僚、士绅、地主占绝大多数的城市。明代中叶以后的许多城市、市镇，都大量吸收农村破产农民，作为雇佣者的后备力量进入城市，使城市得以迅速扩建。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是很有意义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表示日益众多的人口之跟农业分离，即表示工业人口之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㉘

杭城人口中约有半数从事工商业,即所谓“杭民半商贾”,“杭俗之务,十农五商”^{②9}。著名的徽商集团在杭州人口中占很大的比重,杭城有个名叫徽州塘的地方,“钱塘江滨徽商登岸之所,所谓之徽州塘也。”^{③0}

杭州商业、旅游业发达,“四方之游士贾客”占很大比重^{③1},因此在分析城市人口结构时亦要注意到土著与流寓的比例关系。

明中叶以后杭州城市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首先这是与经过二百余年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得以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的。其次,地理位置优越。它“襟江带河,北抵燕而南际闽”,^{③2}“四通八达,冠盖相属,即诸下邑,亦襟联袂接,络绎不绝,而萌繁烘,物产浩穰。”^{③3}外有钱塘江,可通海运,内有大运河,沟通南北。杭嘉湖平原水道交错,交通便利,加以城内外河道密布,津梁畅接,如郡城大河,自凤山水门至武林水门,有桥二十四,小河自钟公桥到武林水门,有桥二十五^{③4}。仁和境内河道更多,有上塘外沙河等十二条河道,水载陆趋极为方便。第三,杭嘉湖平原,腹地广阔,并且气候良好,土壤肥沃,物产丰富,特别适宜于种植蚕桑棉麻,为丝织棉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张瀚说:“桑麻遍野,茧丝绵纈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③5}有这样一个物产丰富的地区,自然需要有一个经济中心,杭州势必应运而重振。第四,五代南宋以来长期所奠定的基础与传统,对明代中叶以来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作用。

二

明代中叶以后杭州城市经济具有什么特色呢?我以为有以下几点:

(一)在一些手工业中已有资本主义萌芽。

在商品经济推动下,杭州市郊及属县大面积种植桑树,育蚕、缫丝、织绸已成为农业中重要的生产部门,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粮食种植业。杭州“环湖沿山之田,民多种桑”,“西湖人家多勤女红,春时皆以养蚕缫丝为业”^{③6},余杭县“妇女尤善御蚕”^{③7}。蚕丝的产量逐年增加,洪武十年杭属税丝25,590斤8两,成化八年为624,210斤,成化十八年为674,889斤,隆庆六年则为684,616斤,二百年间税丝额增加了27倍^{③8}。这一方面反映明政府对税丝搜刮的厉害,另一方面也是蚕丝业迅速发展的有力佐证。蚕丝产量的迅猛增长,表明农村中蚕桑商品生产已大有发展。这为杭州丝织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

明代丝织业中已有民营的工场手工业,徐一夔曾记载元末明初杭州相安里一个丝织业工场的生产情形。这个工场设在一座老屋中,有织机四、五具,工人十多名,“手提足蹴”织绸。机工与织户之间仅是货币雇佣关系,他们完全以自己工艺技术水平来取得工资。机工每天得佣金“二百缗”,技艺高的机工,嫌佣金太低,也可以随意离开原织户到别的工场中受雇,从而可以得“倍其直”的工资。“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这种雇佣关系,封建隶属性已不很强了,货币的潜势力已在发挥作用。生产的规模已是手工业工场,雇佣关系已具有若干自由的成份,所以才说已是资本主义萌芽。

到了明中叶,杭州经营丝织业的织户就更多了。张瀚说:“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张瀚的先祖张毅庵就是其中之一。张毅庵先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水灾淹没了酒瓮,于是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各色纈帛,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③9}这是一条工场手工业者发迹过程的很典型史料。

工场手工业的特点是“在这个地方,同一资本,同时雇佣较多数的劳动者,以至劳动过程扩大了它的范围,可以较大的量的规模来供给生产物。较多数劳动者在同时,在同地域(或在同一工作场所),在同一资本家的命令下,生产同种产品,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⑩如何判断是否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关键是二点:一是生产规模,必须是有分工为基础的协作,这种协作已达到作坊或工场阶段;二是雇佣关系的性质必须是双方只有货币的雇佣关系,一方是出资的雇主,另一方是一无所有的可以自由处置仅有的劳动力的雇工。劳动力已商品化了,雇工已是劳动力出卖者,不存在严重的人身隶属关系了。如果具备这二点,我以为就可以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了。以此来衡量杭州的丝织工场,从上引史料来看,确是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的。

在丝织业中商业资本对组织生产、推销产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杭州及属县的蚕丝和丝织业生产与交换中,商人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如“艮山、庆春二门牙人,负卖线于城,旦晚出入,除舟装外,避免征税。天下组紉之需,莫不举称杭线,而逾此七八里,遂无擅其能者。”^⑪这种“牙人”到底是居于买卖双方中间的牙伥呢?或是本身拥有资金于商品流通中牟利的呢?还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从“舟装”和“避免征税”来看,很象包买商。这种人把产品从产区运到杭州城内发售,在产销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⑫这种居间的商人跻身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中,一方面会使蚕桑业、丝织业从农村自给性的副业逐渐向商品生产过渡,另一方面又加速了商品生产的发展,缩短了商品流通过程,从而推进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逐步过渡。

在锡箔制造业中也有大量作坊或工场存在,有些是个体小商品生产者,也有些已是采用雇佣劳动的工场手工业者。在杭城孩儿巷、贡院后、万安桥一带,“制造者不下万家,三鼓则万手雷动,远自京师列郡皆取给焉。”^⑬从人数来看,一个城市中有这么多人经营这一专门手工业,是很可值得注意的。

(二) 城市周围布满卫星型市镇,形成各级市场网。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杭城周围布满了塘栖、临平、笕桥、瓶窑等大批卫星型市镇,这种市镇都作为经济职能发挥作用,使杭州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并形成了初级、中级、高级几种综合市场。

杭州市郊有两个很典型的市镇:临平和塘栖。临平北距杭城约四十里,是一个老镇。早在隋以前已开发,唐时在此设置盐官,宋为市,明时约有一万人口^⑭。到明代它已是一个蚕丝交易的市场,凡“海宁与仁和上塘蚕丝,于临平市贸易居多。”^⑮塘栖则是另一种类型,完全是一个新兴市镇。它距杭城约五十余里,在宋元以前是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明代人材辈出,民居益稠密”。因为正统七年通判易轸、巡抚周忱在元末开河的基础上筑塘3272丈,建桥72座,塘栖河为漕饷运输孔道,“水陆辐辏,商贾鳞集,临河两岸,市肆萃焉”^⑯,各地商人纷纷赶来经营米丝贸易,如“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駉臻辐凑,望之莫不称为赋财之地。”^⑰由是市镇经济日见繁盛。可以说,塘栖完全是由于交通、商业关系而兴起的,这反映了时代的特色,即它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而兴建的,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因政治或军事需要而兴建的市镇,市镇的职能也与过去大相径庭。

围绕在杭州的周围,有四种市场的组织形式:第一种是临时性贸易的市集(或称墟、集、上市)。这是最初级的市场,只有一个固定的市场,日中为市,日落而息,如杭城内的东花园市、东街市等即是。前者“百货举贸于此”,后者“乡人贸丝咸集于此”^⑱。第二种

是府县所属的一些市镇。如钱塘县的北郭市,交通、商业发达,“百货云集”,更兼有夜市,热闹异常^⑧。这种市镇数量很多,各县约有十余个,这是初、中级之间的市场。它已有固定的市场和商店,每天都有交易,在府县中起了工农业产品的交流作用,也供给农村中生活必需品。第三种是专业性市镇。如余杭县的瓶窑镇是陶瓷业的专业市镇,居民大多习陶,其他商业也因与陶有关而发展起来。朱国桢说:瓶窑“多以埏埴为业,故市廛之与陶穴相望如栉比。”^⑨第四种市镇是各县的县城。它具有二重性,既是各县政权所在地,又是一县的商业活动中心,联结着大小不同的第一、二种市镇,是一种中级市场。至于杭州,除了是所属九县的政治经济中心之外,又是全省各府、县的经济中心,以它为圆心形成一个辐射四方的市场网,连接着苏闽皖赣诸省以及更远的地区,是全国性的高级市场。因此,我认为明代的杭州是一个长江下游区域经济中心之一,具有很重要的经济地位。在此,我感到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在研究中国市镇经济时所提出的那种六角形市镇经济的模式,似乎并不完全符合于江南市镇经济的特点,换言之,杭州及周围的卫星型市镇不一定是按照他所描述的那种模式而结构的^⑩。国内一些经济史研究者认为:“中国从古到今的大小城市,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府根据其政治的和军事的部署,并根据封建‘王制’所确定的等级关系,而有目的、有计划地兴起,其中没有一个由于该地的工商业有了发展而形成的。”^⑪这种看法是否切合历史实际,似乎也需再探讨。很明显的,杭州的塘栖镇、余杭的瓶窑镇、海宁的长安镇等一类市镇,则完全是由于经济因素所推动的,如长安镇“上彻临平,下接崇德,漕运往来,商旅络绎。”^⑫钱塘的范村市,则因“近年(万历)客商物货多于此居停,渐成巨镇”^⑬。余杭的新街市更为明显,天顺以前根本不成市,“邑人邹煜买地开通渠河,四时茶纸薪米诸货毕集。”^⑭这些资料雄辩地说明,明代江南一带市镇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作为大小工商业的中心而逐渐形成的。这是值得重视的新迹象,也可曲折地反映出资本主义的萌芽。

(三) 杭州城市对外地的经济依赖性,即杭州又具有消费型的城市特点。

杭州是手工业发达的名城,商业繁荣的高级市场,又是旅游业很出名的游览胜地。它的经济结构比较复杂,但应该首先肯定它是一个生产性的城市。然而,由于市郊及属县的农业偏重于发展蚕桑棉麻竹果等商品生产,城市人口很多,于是又造成它在生活资料上必须依赖外地供应,即所谓“南柴北米,东菜西鱼”^⑮。从这个角度看,它又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消费型城市特点。历来管理杭州的官吏都很重视生活必需品的补给问题。一旦这个城市发生兵事、灾荒或水运阻塞,城市居民就有饿死的危险,必须平时多储藏粮食。明时在塘栖筑有米栈仓房,每年有数十万石粮食囤积于此以防不虞。顾炎武说杭州是“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皆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⑯聂炎汤则大声疾呼:“若西河占塞,则运河枯竭,所谓南柴北米,官商来往,上下阻滞,而阖闾贸易,苦于担负之劳,生计亦窘矣。”^⑰在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出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种植经济作物远比粮食收入为高,所以发展了经济作物;另一方面也由于商业、交通的发达,少种粮食虽有挨饿的可能,但有了储粮措施仍可应急。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明代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杭州的粮食大部分靠湖广、苏北等地供应,杭州的产品也远销到这些地区,形成了经济的对流。这对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无疑是有好处的。

三

在古代杭州城市发展史上,南宋时达到了顶峰。南宋偏安江南,当时杭州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里居住着皇室、官吏、士绅、地主等,并吸引了各地来的游客,城

市人口空前膨胀,达上百万,官私手工业和商业都非常繁荣。这样的城市发展固然与经济发展有关,但更多的还是由于政治性因素所推动,在某些方面仍有虚浮现象,如果去掉这个政治中心的因素,经济、文化将随之跌落,这就是说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明代的杭州,则是在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重新得以恢复与发展的,虽然表面上繁荣程度不如南宋时期,但却实实在在地是由经济因素所推动的。因此,它的发展基础是比较扎实的。宋明二代的杭州城市经济性质,是有一个巨大的演变过程的,它代表着二种类型的城市。前一种属于比较典型的中国型的大城市,也就是一些经济史研究者所说的根据封建政治、军事、“王制”需要而兴起的,然后才相应地发展了为它服务的工商业。这种工商业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大都是为官府所经营的,尽管也很发达,分工也很细密,规模也很大,但并不具备新质要素。这种城市发展的基础并不稳固,一旦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撑力,经济就很快衰落,杭州城市从宋元以降是经历了这样过程的,傅衣凌先生曾研究过明代开封城市的经济,他称之为“典型的亚洲的消费城市”^⑨。宋代的杭州城市我以为亦属于这种类型。而明代的杭州则又是另一种类型了,它是在商品经济恢复与发展基础上振兴的,是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当然它仍是布政司的政治中心),带有新型城市的性质,商品性慢慢地超过封建性了。

注:

- ①万历《杭州府志》卷33《城池》。
- ②章潢:《图书编》卷38《全浙风俗》。
- ③嘉靖《仁和县志》卷3。
- ④乾隆《杭州府志》卷53,引万历《临安志》。
- ⑤民国《余杭县志》卷38,引嘉靖《余杭县志》。
- ⑥《杭州府志》《物产风俗》单行本卷6,引万历《临安志》。
- ⑦张瀚:《松窗梦语》卷4。
- ⑧万历《宣府镇志》卷20,《铅书》卷1《食货》。
- 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康熙《杭州府志》卷6《风俗》。
- ⑩光绪《杭州府志》卷81。
- ⑪万历《杭州府志》卷34《街巷市镇》。
- ⑫万历《钱塘县志》《纪疆》。
- ⑬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 ⑭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22。
- ⑮叶权:《览博编》,刊于《明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
- ⑯《明会典》卷35。
- ⑰同⑫。
- ⑱同⑭书,卷13。
- ⑲嘉靖《仁和县志》卷1,万历《杭州府志》卷34。
- ⑳嘉靖《仁和县志》卷1。
- ㉑唐龙:《渔石集》卷1《葡萄记》。
- ㉒万历《杭州府志》卷19《风俗》。
- ㉓顾炎武:《肇域志·浙江》。
- ㉔参见《杭俗遗风》。
- ㉕张岱:《西湖香市志》。
- ㉖同⑳。
- ㉗《张居来先生集》卷66。
- ㉘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1页。
- ㉙《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杭州府部风俗考》946卷。光绪《杭州府志》卷6《市镇》。
- ㉚乾隆《杭州府志》卷5,《市镇》。
- ㉛章潢:《图书编》卷38。
- ㉜同⑫。
- ㉝同⑪。
- ㉞同⑫。
- ㉟同⑦。
- ㊱《杭州府志·物产风俗》单行本卷6,引《西湖志》。
- ㊲同⑤。
- ㊳参见《杭州府志·物产风俗志》单行本卷6《物产》。
- ㊴张瀚:《松窗梦语》卷6。
- ㊵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84页。
- ㊶同⑳书,引《艮山杂记》。
- 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5页。
- ㊸乾隆《杭州府志》引万历《杭州府志》,转引自⑳书,卷8。
- ㊹参见崇祯《临平记》。
- ㊺同⑳书,引《成化志》。
- ㊻光绪《塘栖志》卷1。

⑭同④书，卷18《事纪》。

⑮同②书，引《万历志》。

⑯同⑤。

⑰朱国桢：《真寂院记》，转引自民国《余杭县志》卷3《市镇》。

⑱参见施坚雅（G. wicciam Skinner）：《市场及区域经济的结构与发展》，并参阅《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

⑲参见《经济研究》1978年第7期，第57页。

⑳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91。

㉑同⑤。

㉒同②书，引《嘉靖志》。

㉓西湖浪子：《三刻拍案惊奇》第26回，《隐衷花空隐，湖头计更奸》（手抄本）。

㉔顾炎武：《肇域志·浙江》。

㉕万历《钱塘县志》《纪胜》。

㉖傅衣凌：《明代开封城市的经济形态》，刊于香港《抖擞》第42期。

（上接第13页）

产工人的生产时间利用率也很高，有些甚至挤占了吃饭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机器设备的正常维修和劳动保护措施不能很好落实，就是产值、利润指标的不断上升也难以继。技术上的革新实为这类企业的当务之急，但在利润、产值指标的重压下，企业一般腾不出手来进行这项工作。对这种企业应该改用以成本指标为主要指标的考核方法。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可以减轻产值、利润指标的压力，为企业进行革新改造创造条件。并且，以成本指标考核，企业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原材料耗费、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资金占用等多方面的努力来降低成本，而这些努力都有赖于技术革新，这就可以促进和鼓励企业搞技术革新。其二，以成本指标考核照样可以促使企业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做出贡献。

最后，还有必要强调一下考核指标的严肃性。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考核指标一旦确定之后，不能随意改动；其二，考核指标所反映的数字必须是真实的，决不允许弄虚作假。因为考核指标中不仅体现了国家对企业的要求，还涉及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统筹安排，指标的随意变动，无疑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对于工业企业来讲，指标还是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的检查尺度，随意变动，就失去了标准。指标随意提高，使先进企业得不到相应的鼓励；指标任意降低，起不到对后进企业的督促作用。所以，必须坚持考核指标的严肃性，才能搞好对企业的考核。